

一所培养抗日人材的学校——东山中学

黎元善

东山中学是朱婴同志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创办的一所培养抗日人材的学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四”事变发生后，朱婴被迫离开上海辗转回内地。一九三八年元月，他途经武汉时见到了董必武同志（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董老要他在国民党区办教育，一则以推动抗日，二则输送青年去延安。朱婴奉董老指示，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回到华容，随即着手办学。他不辞辛劳走访地下同志，巡视东山地区，发现其黄鹤岭一带不仅山岭重迭，反动势力比较薄弱，而且是我党活动的老苏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理想的办学之地。于是他计划：如果武汉、岳阳能够守住，华容不致沦陷，就在这里办一所中学，有条件时，将来还要办一个大学或专门学校。要是敌人来了，就带领学生打游击。他积极联络当地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包泽英、蒋子辉、廖凤昇等人商谈办学事宜，他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恰好此地有益阳人孙慕韩办的一所私塾（塾学），学生只有十余人，景象十分冷落，早已不能维持。朱婴便亲自前往与他联系，合作办学。就在这所私塾的基础上，朱婴将学校改为“东山书院”，重建学制，并提出了为抗日培养一批有志之士的教育宗旨。消息传出，远近闻名，不到一月，学生骤然增至五十余人。朱婴根据当时形势发展，又把“东山书院”正式命名为“东山中学”。并聘请董必武、沈钧儒、钱俊瑞、邹韬奋、黄松龄、章乃器、沙千里、包泽英、韩梅村、蒋子辉、廖凤昇、方初祺等党内外知名人士为校董，以董必武为名誉董事长，组成“东山中学校董

会”，朱婴任校长。学校招生广告贴出，爱国青年蜂拥而至，于秋季开学时，学生已增至二百多人，计有五个教学班：

初三一个班，初一、初二各两个班，每班四十多人。学生主要来自华容、益阳（两县最多，均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南县、安乡、石首、监利、岳阳、沅江等地。

学校开办初期，受到了中共党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注与支持。何长工同志曾来信热情祝贺，并特别指出：学校“无事则为弦歌之地，有事即为戎马之场”。中共湖南省委派共产党员韩劲风、朱维泗分别担任学校训育主任、军事教官等，韩劲风同志并负有建立党组织的使命（后来他物色了七、八名学生作为发展对象，不意学校停办，故学校党组织并未正式得以组建）。为了解决办学经费困难，童必武同志在每月只有一元津贴费（当时实行供给制）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捐献出光洋十元给以资助。同情抗日，热心公益事业韩梅村（华容东山乡人，当时任国民党旅长，一九四六年在辽宁阜新率部起义）捐献了光洋一千五百元，还有其他爱国人士也纷纷资助，使学校得以顺利地开办。

学校办学的指导思想是提倡苦学、注重实践，主张在斗争中求知识。学校一开办，朱婴就明确指出了“苦学力行”的四字校训，并亲笔书写悬挂在校门上，把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作为教育实践的重要课题。他常说，一个人必须从幼年就要注重培养美好的情操和高尚的品德。正因为他极其重视学生思想教育，所以学校除开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一般中学课程外，还重点开设政治和军事课。每周作时事报告一次，宣讲当时抗战形势和介绍抗大的学习生活，这些材料大都是朱轮（朱婴的弟弟，现任河南省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从延安写来的报告。政治课主要

讲《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十月革命》；军事课主要讲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术原则；音乐课主要教唱《游击队歌》、《热血》、《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学校办有阅览室，阅读的报纸有《新华日报》、《观察日报》及邹韬奋主编的《群众》杂志。还办有墙报，辟有“延安通讯栏”，介绍延安的“抗大”、“鲁艺”及“陕公”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就抗日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学生思想活跃，学校充满着民主、自由的气氛。

为了使学生们肩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学校组织学生每天清晨跑步和爬山，农忙季节帮助农民插秧割稻，课余或星期天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由于办学思想明确，训导有方，东山中学校风优良，深受当地群众和社会开明人士的一致称赞。因为她完全革除了昔日旧学校——特别是私塾中富贵子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厌恶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恶习。在新与旧的对比中，东山中学的美名不胫而走，广为传播，黄鹤岭上沉睡千古的“黄鹤”展翅欲飞了！

东山中学红旗招展，映红了苏区，唤醒了同胞，惊坏了反对派。正当她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时，谣言也紧跟着来了，特别是武汉、岳阳相继失守后，谣言更加猖獗，说什么“东山中学是拿八路军的津贴，是陕公分校，挂马克思、列宁象，有武器，有无线电”等等。反动派异常害怕，视为眼中钉，并经常派特务监视、侦查、铜吓。用尽种种卑劣手段进行破坏，威胁学生家长，强令子女离校。更有甚者，伪县警察局长徐尚达向国民党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官麟征密告，谓韩梅村（时任官麟征属下的旅长）拿国民党的钱私自给共产党办抗日学校，应予严厉查办。不久韩梅村被革职，借此向朱婴施加压力。加之学校内部也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那个自称同情抗日的孙慕韩，借学校危难之时，趁火打劫，将学校公款悉数卷逃，经

费告罄，学生吃饭成了问题。在内外夹击的险恶环境下，学校于十月底用“因日寇飞机在学校上空盘旋，威胁着学生的生命安全，学校决定停办”的通告宣布停办。朱婴处此逆境，毅然带领全家和进步学生共十五人组成“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北上，奔赴抗日根据地——延安。

附 录

一、东山中学校董会成员名单

名誉董事长：董必武

董 事：董必武、沈钧儒、钱俊瑞、邹韬奋、黄松龄、
章乃器、蒋子辉、沙千里、廖凤昇、毛泽东、
韩梅村、刘祁祺、季守文。

二、东山中学行政领导及教职员名单

校 长：朱婴（教政治、军事、英语）

训育主任：韩劲风（四川人，共产党员、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来，教英语）

教导主任：孙慕韩（益阳人，教语文、数学、历史、地理）

事务主任：蒋子辉（华容东山人）

军事教官：朱维泗（共产党员，留俄生，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派来，原是八路军的一个副团长，负责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训练）

军事教官：刘干城（华容东山人）。

教 员：王步周（四川人，留法生，教法语、数学）

教员：刘熙安（益阳人，教数学）

熊正阳（华容人，教语文）

职员：吴应刚（四川人，负责刻写、收发等工作）

（本文系据朱婴、朱允一、朱允雨、罗志雄、易芝生、郭劲风回忆录及走访蒋子辉等人口述材料整理而成）

一九八四年九月

抗日初期华容《怒吼周报》的始末

张华贵 陈国钧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为了组训民众抗日，动员了全省凡参加过集训的高中以上学生，分派各县担任民众训练工作。县设民训总队，区设大队，乡设中队。

这次我们派回华容来的有二十多个同学，大家都怀着抗日救亡的满腔热情，除了积极地去完成组训民众的本职工作以外，还利用工余时间联合当地青年同学从事各种抗日宣传活动。

开始我们在城关镇及各区乡所在市镇出版了墙报，后来感到墙报出一张只一张，发行有限，影响范围不大；且一旦遭到风吹雨打，立即销声匿迹，不能充分发挥宣传作用。六月，由魏 鑫（三封寺人、湖大学生）、罗祖宁（罗家咀人、清华大学学生）、赵粉藩（状元街人、省农院学生）、杨明潜（广山人，省一师学生）和我们两人共同发起出版《怒吼周报》，决定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对县里某些不良现象也适当进行评论。

当时因为华容还只有石印，我们便将周报送到南县去用铅印印刷，每期出版四开四版一张，每期发行二百份，无偿分送全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县城各商店阅读。

周报社的社址设在城关南郊外的朱公庙，虽只三间破旧不堪的房子，但成了当时我们这群青年学生之家。我们除了编印《怒吼周报》外，还成立了歌咏队和剧团，参加的青年男女学生有四、五十多人。负责剧务的是赵树藩和张华贵，负责歌咏的是胡若君（女）、陈国钧；芦道庸任教练和指挥。

我们的经费都是自己捐助筹集的，其中魏鑫、罗祖宁两同学出得最多。

剧团和歌咏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曾在城区、站市、汪市、大乘寺等地进行了公演。演出的戏目有《松花江上》、《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等，教唱的歌曲有《我们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曾受到广大民众的赞美与欢迎。

抗战的怒火燃烧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为了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不做亡国奴，我们每一个青年同学都决心以各种不同形式战斗、战斗！

在“七·七”抗战一周年活动时，县立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开展劳军募捐活动，县城一个姓罗的著名富户一毛不拔，我们便写了一篇《忠告某有钱人》的评论在《周报》上批评了他。又如当时第四区区长刘以约贪污有据，经群众告发，我们在《周报》上发表了《关于刘以约的贪污案》的文章，促使县府将刘逮捕。

不料我们年青同学们的这些正义行动却触怒了当时地方反动统治集团。伪县长王强毅（解放后已镇压）派人把张华贵叫到伪县政

府大加“训斥”；他的主任秘书徐良育并恐吓说：“我在省党部当过宣传科长，你们办报纸没有登记，县政府有权查封报纸，也有权拘押人”。张被传讯，激怒了各乡的民训同学，大家纷纷来人来电向县政府质询、抗议。王强毅怕惹出更大的麻烦，只得让张华贵回去了。

这次事情虽悄悄平息，但在秋后的一个黄昏，忽来一群打手对报社进行突然袭击，并将魏鑫等人击伤。事后向县政府申诉，却置若罔闻。

之后，由于大部分民训人员的返校复课，《周报》所处环境又日趋恶劣，只得宣告停刊。抗战初期在华容的抗日宣传工作上曾泛起过一朵浪花的《怒吼周报》，出版还不到二十期，连同其他演剧、歌咏等活动，便这样一同夭折了。

谭 宋 铎 整 理

《难忘的历程》之二

从东山书院到东山中学

罗志雄

一九三八年三月东山书院开学时，朱老派允一同志来接我上学。我父母正因为我就读的长沙雅礼学校已迁往湘西沅陵，不愿我远离，听说朱老办学和永禧哥（当时我这样称呼允一同志）等在一起读书，非常乐意。到校后，朱老也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高兴。

校舍是租用黄鹤岭黄恣健家的一幢三间两进的瓦房，上堂屋作教室，五十余人济济一堂。宿舍和食堂设在偏屋里。这里地处巴华两县交界，不仅山峦重迭，环境优美；而且是我党活动的老区，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原先益阳人孙慕韩在这里办了一所私塾，只有十多个学生。朱老看中后，经与孙协商，双方同意合作办校。教师就只有朱老和孙两人，孙教语文、数学，朱老教政治、英语和军事。

政治课主要讲：“万里长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介绍延安“抗大”的学习生活。军事课则着重军事训练。每天早起，朱老便带着我们跑步，翻山越岭，锻炼身体。有时军事课也举行爬山比赛。附近的狮子山、天井山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同学中只有四个女同学，其中有朱老的女儿朱允丽、孙慕韩的女儿孙凤彩，她们也和我们一道坚持训练，从不落后。

课余时，朱老给我们讲“八百勇士”、“勇敢的薛团长”、“井岗山的战斗”等。朱允丽则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不会亡》、《谁愿做奴隶，谁愿做牛马》，“前进！中国的青年，抗战！中国的青年！……”这悠扬雄壮的歌声，冲破了黄鹤岭的沉寂，点燃了老根据地人民抗日的怒火。

春耕期间，朱老带着我们帮助附近农家插秧，他农民打扮，赤脚下田，秧插得整整齐齐又快又好。至今想起他老人家言传身教，要我们爱祖国、爱劳动、“苦学力行”，做一个有作为的人的教导，还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有一次他抚摸着我的头，望着我被晒红的脸笑着说：“洋学生由白变红了，打算什么时候去美国呀！”我也笑着回答：“您想撵我走呀！我偏不走，就和您在一起。”其实，他老人家也知道如此火热的生活，把我那原先确实存在过的赴美幻想，早已冲击得烟消云散了。

这年的五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朱老即已着手规划学校改名和扩大规模的筹建工作。他一方面和外界人士联络，酝酿成立新的校董会；一方面积极募捐集资，以便扩建校舍，添置教具；还要设法聘请教职员，真够忙的了。

七月中旬学校放了暑假，同学们各自回家度假，孙慕韩也回益阳去了。只有朱老仍然留校忙筹建。这时，董肇韩梅村（华容东山人，国民党旅长，1946年在热河（注）起义）寄来光洋一千五百元。董必武同志节衣缩食，也寄来光洋一十元。还有其他董肇和爱国人士都纷纷乐捐，扩建工作初具规模。八月十日朱老赴县城与教育局长张耀环谈妥了备案事宜，批准东山书院改名东山中学，扩校招生。二十至二十七日朱老在县城和东山校本部两地，孙慕韩在益阳同时招生。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左右，由孙慕韩负责在益阳招来的师生队伍六十多人，其先遣队到达我家。我母亲忙给他们烧茶做饭，父亲和我从麻里泗堤上挨家借来十多个竹床、十多把躺椅，加上自己家里的木板门片，做好了食宿准备。七时左右队伍到齐，其中有益阳藉老师刘熙安（武大毕业）夫妇，是来教数、理、化的。还有一

个姓李的女生管理员（师范毕业）。他们都只有三十来岁。晚饭后，同学们到麻里泗港子里洗完澡，就聚集在禾场上乘凉。在皎洁的月光下，同学们自由地歌唱，亲切地叙谈，欢歌笑语，乐极一时。二十九日吃完早饭，我父亲雇了六匹马，四匹让老师们骑，两匹专驮行李。同学们都是步行。我目送这浩浩荡荡的队伍向东山进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留恋之感。第二天，我和刘泉源（华容护城人）两人便迫不及待地纵马向黄鹤岭飞奔而去。走到校门前一看，真是大变样了：校门口挂着“东山中学”的校牌；门顶上横挂着一块朱老亲笔写的“苦学力行”四个大字的横匾。看着我们来了，允丽姐连蹦带跳地迎了出来，告诉我们：全校设了五个班（两个初一、两个初二、一个初三），有学生二百多人。女生也增到了七七八八，有岳阳崇信女中来的白定珩（现在纽约报社工作）、严智娴（现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们都很洋呀！其余不少是益阳来的。我一面听她介绍，一面看到了学校的兴旺景象，心里激动极了。这时，朱老穿一套白竹布短装，过来拉着我的手，要我赶快放下行李去休息。我哪里顾得上休息，把行李一放就跟着朱老跑上跑下地忙开了。

九月一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全校两百多同学齐集在操坪里，朱老和老师们都坐在主席台上。典礼开始后，朱老宣布东山中学已向政府备案正式成立。东山中学校董会正式成立。接着宣布校董会董事和教职员名单。校董会有：董事长：董必武，董事：谢觉哉、翦伯赞、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钱俊瑞、黄松龄、刘祹祺、李守文、廖凤昇、包泽英、韩梅村、蒋子辉等。教职员有：校长：朱晏（教政治、军事、英语）、训育主任：韩劲风（四川人，共产党员，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来，教英语），教务主任：孙慕韩（益阳人，教语文、数学、史地），事务主任：蒋子

辉，事务员：孙可一（孙慕韩的儿子），主任军事教官：朱维泗／（益阳人，共产党员，苏联留学生，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派来，原任八路军某部副团长），军事教官：刘干城（华容东山人），教员：王步周（四川人，法国留学生，教英语、数学），刘熙安夫妇（益阳人，教数、理、化和语文）、熊正阳（华容人，教语文），女生管理员：李爱莲（益阳人），职员：吴应刚（四川人，负责办公室刻写和收发工作）。朱老在讲话中着重讲述了他制订的“苦学力行”的校训。他说：“苦学”，就是主张在斗争中求知识；“力行”就是注重于实践。概括起来，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要求同学们刻苦学好本领，挽救祖国的危亡。接着训育主任韩劲风讲话，他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他们的讲话激励着同学们的心弦，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本期虽然增设了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科，但学校仍然十分注重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军训方面，刘干城老师负责操场教练、教典范令，从徒手操到班排战斗教练；朱维泗老师教游击战，时常搞夜间演习，熟悉地形地势。同学们最爱搞演习，个个精神抖擞。因为演习可以使人增长勇气和智慧。每当演习结束后，大家高兴地唱着《游击兵团战歌》：“白天是我们的世界，黑夜也在冲锋／……，”一身的疲劳便全消失了。

学校设有图书馆。有各种进步书籍，以生活书店出版的为最多。也有武汉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延安的《解放》以及《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还有从延安寄来的“抗大”、“鲁艺”、“陕公”学习生活的通讯。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阅读报纸，学习时事，定期出墙报，出诗刊，自由讨论思想问题，讨论对时局的看法。经常利用课余或星期天组织学生向群众进行演讲、宣

传时事。同学们都感到祖国是北方亮南方暗，每个人都向往革命，向往延安。

在进行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中，有两次较大规模的行动，令人永久不能忘怀。一次是“九一八”；一次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九一八”那天，学校经过挑选组成了五十余人的宣传队，在附近村子里向群众宣讲日本鬼子在东北沦陷区奸淫烧杀我同胞的残暴罪行，教群众唱《松花江》等抗日歌曲，以激发群众对日寇的仇恨，激发群众以抗日救亡为己任的决心。为了迎接辛亥革命纪念日，我们很早就赶排了几个短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山海关》、《松花江上》等。朱允丽、白定新、严智炯等都是积极分子。尤其是白定新，伶俐大方，感情充沛，姿态优美，是个富有天才的演员。十月九日，我们这支六十多人的宣传队，在朱老的率领下，冒雨赶到了塔市驿镇。十月十日雨霁天晴，白天，我们在街头的茶楼酒店作抗日宣传，教唱救亡歌曲；晚上，在万家槽坊的大厅里用木板搭了个舞台，点上两盏汽灯，演出了我们排练的剧目。两百多个观众无不义愤填膺，群情激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黄鹤岭上红旗飘，抗日怒火遍地烧。老苏区显得更加热火朝天，各地的群众也深受影响。这可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于是，谣言四起，特别是武汉、岳阳失守以后，更是猖獗一时。说什么“东山中学拿了八路军的津贴，是陕公分校，挂马克思、列宁像，有武器、有无线电台。”伪县长王强毅就曾带领十多个特务进入学校，象疯狗一样到处嗅。伪警察局长徐尚达更是经常来侦查，并指示暗藏的C·C特务学生对进步学生进行恫吓。学校处境愈来愈险恶，加之学校干部中有的过于幼稚软弱，有的闹宗派，有的贪污自私，不顾

大局。如孙慕韩在危难之际就趁火打劫，把公款悉数卷逃。经费告竭，师生们的吃饭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朱老毅然决定：解散学校。同时，将一部分爱国学生组成“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奔赴抗日根据地——延安。

从东山书院到东山中学，虽只短短七个来月的生活，但在我的思想上，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注：黎元善同志稿中为“辽宁阜新”。孰是待查。

民主革命的老前辈——刘德昭

刘 咏 诗

刘德昭（其出生年月尚待查考），华容县东山人。幼读书，曾教过私塾。早年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后改组为同盟会）。在反对北洋军阀窃国时期，他在东山高真庙寨子岭及墨山一带山区进行秘密活动，组织群众扩展革命势力，为支持广东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力量。

一九一六年，刘德昭召集同志二百余人，密谋夺取县城，壮大革命声势，于是年四月十九日，分两路进军至松木桥，被雨阻滞，就地宿营，一面休整、一面补充武器。四月二十二日拂晓，天还未晴，当地团长（团是现在乡的名称）罗某，暗地指使集上的商店住户鸣放鞭炮欢送义军上县，实则怕担风险，催其速走。义军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就此离开松木桥向华容县城进军。

华容县有故城周围环绕，圆圈七里零三分，分为东、南、西、北。小北门五座城门，城高约一丈五，加城垛共约二丈。城门日则开放，夜则关闭上锁。每城门上有城楼，为巡察巡警之所。东城内和市区中心为商店户贸易市场，有屠案十余家。义军一到东外街，就夺取屠刀作为兵器，进入东门，直奔西门县知事公署。

这时县署人员因阴雨连天，防范疏懈，而且有反动武装团防局张阴祚（号巨卿）率领的兵勇驻在状元街张的别墅，因此义军直入，无人阻挡。闯到后衙，知县谢子庆已起床登厕，闻声逃匿。其兄谢科长（谢湘群）从梦中惊醒，急起欲逃，义军赶上前去，手起刀落，一命呜呼。城内一时沸腾，关门闭户。消息递传到张，张随带九响步枪十余枝，率全部兵勇赶到县城，下令紧关城门，进行反扑。义军仅有菜刀、屠刀，抵挡不住，只得向东南城边撤退，瞥见城门落

锁不能出关，纷纷踊跃上城，从垛口跳向城外，奔回东山。其勇敢无畏精神，使敌人望而生畏，不敢追袭。

伪团警兵丁，看着义军撤走，遂虚晃声势，在城内四面搜查，见穿湿衣的人，便指为义军，格杀勿论。东街王家麻绿铺的麻子儿，因买豆腐出外被雨淋湿，当被斩首。其他无辜遭杀者，不知凡几。后来有人作竹枝词讽刺刘德昭中有句云：“放羊洲上千坯土，尽是刘郎去后埋。”可以想见当时反动军警残暴之极。

刘德昭越城出险后由麻里泗渡到老友蔡春霖家（现潘家乡永红村），躲在楼上两月之久不敢露面。华容伪团防在义军扑署之后，接着清剿东山，搜捕革命人士。事态平静后，刘德昭才投奔广州，受命为大总统府秘书。一九二一年，广东军政府改派他为江南游击司令，在淞沪一带进行活动。

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合作，获得苏联帮助，创办黄埔军事学校。刘在上海积极拥护，秘密招收湖南青年学生。我县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蔡粤（蔡春霖的长子号大容，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中在浙江龙游战役时殉难）就是他资送到广州去的。

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刘任职于贺龙元帅之第九军，由于蒋介石排斥第九军，因而刘德昭亦遭忌视，于一九二七年离队，在汉口、长沙等地寓居，改名刘嘉苏。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陈铭祖、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刘德昭与桃源覃振（号理鸣）向往，共襄其事。时局不久，湘人

民政府解散，刘、覃又同到南京。覃振被任为司法院副院长，刘未受礼遇，遂寄居老虎桥同族刘翠堂家，以医济世。日寇沦陷南京后，他折返湖南常德，仍行医道。一九四一年常桃会战，回华容原籍，四三年曾住县城东街罗甸原家。华容县城失陷，转移南县麻河口舒家木行避难。旋定居于华容西乡硯溪渡。一九四七年病逝在家，有子一女一。

刘德昭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幼年时代，出生入死，反抗封建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煞费心力。而在北伐胜利之后，却遭受屈抑，不能展其志，良堪痛惜！然中途未变节，未同流合污，无负于人民，堪以瞑目于九泉矣！

余与刘公一九二七年春在湖北汉口有一面之缘；一九四三年，在南县麻河口舒家曾数次晤谈，因知其梗概。而刘公之于民主革命敢闯敢干，其事业必有甚于此者，余不能详尽，深表愧恨！加以年代久远，事迹鲜传，谬误之处很多，希望刘公之故旧，赐予指导教正。阐发其微，俾后之人，永志勿替云。

一九八四年五月

华容县历届知事、县长录（一）

（民国元年：1912·1 — 三十八年：1949·7）

刘 复

编者按：

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旬老人刘复亲笔写下了《华容的知事、县长一瞥》，简要介绍了从民国元年到解放时华容县历届知事、县长姓名、任职年月和政绩好坏。近日经黎元善同志等走访城关镇刘骢、刘味诗、蒋子辉和王伏生等老人又进行了核实补充。现予从新整理，以飨读者。

谢 康 云（子 庆）	1912年春、夏。
伍 汉（叔 靳）	1912年秋、冬。
刘 宗 训（浏阳人）	1913年春至同年冬。
凌 运 寅	1914年春至同年冬。
徐 世 镛	1915年春至1916年春。
谢 骧 祥	1916年夏至同年冬。
何 扬 烈	1917年春、秋。
方 直（号古愚，岳阳人）	1917年冬至1918年春。
李 祚 藩	1918年夏。
夏 逢 时（蕲水人）	1918年秋至1919年冬。
朱 芾（湖北人）	1920年春至同年冬。
沈 镇 湘（湘乡人）	1921年春至同年冬。
王 政 诗	1922年春。
刘 端 康 ⁽¹⁾ （长沙人）	1922年夏至1923年夏。
徐 崇 立 ⁽²⁾ （长沙人）	1923年秋、冬。